联合国 S/PV.4943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十九年

第四九四三次会议

2004年4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普洛伊格先生	（德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本迈希迪先生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贝宁	阿德奇先生
	巴西	萨登贝格先生
	智利	穆尼奥斯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菲律宾	巴哈先生
	罗马尼亚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萨科夫先生
	西班牙	梅嫩德斯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西夫先生

议程项目

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

04-31026 (C)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企业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世界银行行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西门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因里奇·冯·皮埃尔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西门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玛尔亚塔·拉西女士阁下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沙德拉克·库马洛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请允许我首先讲几句话，对本次会议的框架作出解释。

在预防冲突——以及冲突后复原——过程中，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密切相关。这一点必须在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内外，包括国际金融机构中得到反映，而世界银行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机构。为了改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团结和效率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成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在这方面，整个私营部门各个企业的作用应得到特别注意。这一方面涉及到一整套企业责任和所谓的“公司全球公民地位”，另一方面也涉及到私营部门可以在任何国家和区域发展或重建战略中发挥的巨大潜力。

今天，由于全球化，国际私营部门参与容易发生冲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问题的程度较以往几十年更大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是防止武装冲突和出现失误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只有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才能落实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进程。安全理事会半年前派往阿富汗的代表团从实地体会到，只有具备了真正的替代办法，即真正有维持生计的前景，士兵和战斗人员才愿意放弃武器。

我认识到，本次会议是这种形式的第一次讨论。我认为，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论坛，由安全理事会讨论工商界能够在防止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发挥的作用，是适当的。

我谨代表安理会的同事，对在武装冲突这一重要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行动者的代表表示欢迎，他们是：秘书长、联合国系统的代表拉西大使和库马洛大使以及全球金融和工商界主要行动者的代表沃尔芬森先生和冯·皮埃尔先生。

在请我们邀请的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提出一个小的请求。我请安理会成员将在实质性讨论中的发言限

制在 5 分钟之内。否则，我们无法在中午 1 点前后结束。我们还希望能够让我们邀请的发言者有机会在安理会成员发言之后对讨论中的提问和评论作出回应。因此，如果各位成员能够限制发言的时间，我将不胜感谢。如果安理会成员的发言时间长，可将发言以书面形式散发。

我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与会表示欢迎。我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国政府在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的主动行动。武装冲突涉及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常常受到忽视，但决不应低估这些问题。尤其是工商界的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关系重大。

私人公司活跃在很多冲突地区和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里。它们在投资和就业、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在保护当地环境及其自身安全的安排方面作出的决定，要么会有助于国家摆脱冲突，要么会加剧紧张局势，而正是紧张局势首先推动了武装冲突。

私人公司还生产和出售冲突的主要硬件，从坦克到小武器、杀伤人员地雷甚至砍刀不一而足。私人企业和个人参与对利润丰厚的当地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贸易，例如石油、钻石、精神药物、木材和钶钽铁矿石，后者是很多高科技电子的重要成分。各国政府和反叛集团以这种方式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支持军事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冲突造成的混乱使得资源被非法开采，或者开采很少考虑到平等和环境。在当地人民被排斥在讨论之外，或无法获得和控制自然资源，地方社区因而从中受惠甚少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多的冲突。

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挑战，涉及到主权、民主施政、企业的责任以及个人的尊严等根本问题。此外，很多有关的交易是在暗中进行，或在失误的国家内进行，这些国家没有能力控制那些追逐利润和为冲突火上浇油的活动。旨在制止这些活动的执法和监督措施，即使是有的话，也常常缺乏力度。供应链常常盘根错节，想要实现更大的透明度也无济于事。甚至是法律活动也会莫衷一是，遇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工商界本身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特别是公司需要有稳定的环境，才能开展业务和减少风险。他们的信誉，不仅仅是在公众中的信誉，而且在雇员和持股人心中的信誉，不仅依赖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而且依赖如何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他们的底线再也离不开联合国和平、发展和平等的主要目标。所有这些，就是为什么工商界应该主动地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

就其本身而言，安全理事会已处理了很多这种问题。安理会实行了目标明确的制裁。安理会支持了金伯利进程，这一进程通过自愿性举措减少了所谓的冲突钻石的贸易。安理会成立了专家组评估政治经济引发或维系冲突方面的作用。安理会授权部署了若干维和团帮助监督经济制裁和军火禁运，支持重建国家对自然资源管辖权的各种努力。

本次会议是在几项重要倡议的背景下召开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了《多国企业准则》，希望是确保公司能够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国际公约。联合王国牵头提出了一项倡议，目的是增进冶炼业的透明性。若干会员国颁布了安全和人权方面的自愿性原则，以便在安全和保护分包给私人公司的时候确保在落实安全和保护时能够防范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本人提出的《全球影响》致力于改善全球企业公民意识。我们就这一问题举行的对话的一个成果是“冲突影响评估和风险评估商业指南”。《全球影响》的成员国也在讨论在关于人权、劳动标准和环境的现有 9 条标准之外增加关于腐败问题的第 10 条原则。他们并在讨论如何能够帮助执行新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们大家，即各国政府、工商界、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都需要学习以更公开方式在透明的情况下运作。如果我们想要打破腐败的恶圈，树立人们对我们各种机构和企业的信心，这就是至关重要的。

就联合国的具体情况而言，会员国大概都知道，我正在着手对有关我们过去开展的石油换粮食计划的诈骗、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指控进行独立的调查。透明度不仅是对付这种指控的唯一办法，而且迄今为止首先是防止出现腐败现象的最佳办法。我认为，无论其调查结果如何，这将是我们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学到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这些努力和举措只不过是开始对付这些问题。现在必须将各种专门的努力转变成为有系统的方针。这种方针将在联合国推动本组织的安全和发展部门之间开展更大程度的合作。这种方针将使我们获得一些手段，用以更好地理解并更积极地影响那些使武装冲突势头日趋严重的经济刺激因素和抑制因素，而且这种方针还将确保这些因素反映在防止冲突的努力、和平协议以及赋予和平行动的任务之中。

我铭记这些目标，因此设立了一个由政治事务部主管的机构间小组，密切注视武装冲突的政治经济因素，并将提出各种建议，说明如何改善联合国系统和各会员国的对策。我促请安理会和所有会员国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并更加积极地与私营部门联系。秘书处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予以协助。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感情色彩很强烈的议题。我们必须在诱导和强制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有时候，愤恨是唯一的适当反应。有时候，人们对共同利益发出的呼吁充耳不闻，但在如此得失攸关之时，我们无法经受的局面是：有关行动者两极分化，将对方说成是魔鬼，从而无法开展对话。我们必须开辟一种空间，使大家聚集一堂，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希望本次会议将为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发言。

沃尔芬森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邀请我与会，这是世界银行行长有史以来第二次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第一次是在四年之前，当时我们聚集一堂，讨论作为安全问题的艾滋病的影响问题。那个问题以前和现在都很重要。现在人们的头脑中首先想到的是在政治方面干预和解决伊拉克冲突和阿富汗冲突的问题，但安全理事会能在此时处理这一问题，因此我立即要说的是，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我感到高兴地出席会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机构认为，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重建的问题——这就是今天讨论的议题——可以从冲突的起因和实现和平的办法的角度予以最佳地察看，秘书长已经谈到了其中的一些方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着一种相当直觉的但并不是十分复杂的观念，那就是如果某人有了工作也有了希望，这个人就不大可能出去枪杀他人。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观念，但我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进行了研究，证明了这一相当显然的观点，因此我要引用本机构的同事所作的研究报告中的话，其中明确指出

> “我们的研究表明，过去 30 年期间多数冲突的根源，更主要的是缺乏经济机会和由此产生的对稀少资源的竞争，而不是种族、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根据我在世银的经验，无论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西岸、加沙、也门、东帝汶、科索沃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听到的是，在所有出现紧张局势的地方，在许多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到那里后发现，在恢复了某种程度的和平之后，在人们已处理了教育、保健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社会问题之后，人们必须首先察看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可以开始工商业务的框架。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十分重视国际投资。我特别感到高兴，冯·皮埃尔先生在此出席会议，因为他的公司已在全球开展工作。但国内投资额是国际投资额的四倍，因此，在我们谈论工商业时，我们思维的依据确实必须是创造一种地方环境，用以鼓励地方投资，以便繁荣中小型企业并发扬创业精神。保尔·马丁和埃内斯托·塞迪略两人在应秘书长要求进行的研究中对此作了大量论述。

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的建议是，在处理预防冲突的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拥有一种人民可分享的不断成长的经济。我们又一次对 60 个国家中的 6 万名穷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其答案是我们可以得出直觉的结论。这个答案就是穷人和富人一样，都希望在和平中生活，并有自己的社区。他们不需要施舍——他们要的是机会。他们希望他们的妇女不要挨打，希望有自己的子女，他们希望和平。

在当今世界的 60 亿人中，有 28 亿为 25 岁以下的人，其中是 15 亿为 15 岁以下的人——未来 25 年，又将有 20 多亿人进入我们星球的发展中世界——正如秘书长再次指出，关键的挑战是我们如何为青年人找到工作机会。如果他们没有工作可做，他们将会感到失望。他们立即的本能不会是出去制造战争，但他们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受到那些存心不良者的影响，也会受到那些或者是伪装成他们一员的人、或者是为了非法目的或攻击性目的而利用他们的人的影响。

因此，在我们的机构内，我们正在用极其大量的时间，试图了解我们如何可以满足这 6 万人以及和他们一样的人的各种需求。这是十分简单的需求：我们如何给他们在公平的环境中工作的机会？在这里，我们要处理秘书长提及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可以建立的法律框架、保护各种权利、反腐败运动以及创造机会，使人民在稳定的环境中生活。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告诉我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这项研究是有益的，但就直觉思维而言或许并不是必要的。

然而我们已经开展了工作，并以我们能采用的各种方式证明，使人民得到希望是避免冲突的最佳方式。为他们的生活进行投资，使他们有机会考虑子女的问题，并使他们的子女获得机会，这就是制止他们出去制造冲突的最佳方式。因此，在我们谈论安全理事会关于预防冲突的问题时，其中心问题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概念，那就是给人民以工作和机会。因此，我认为这一议题对本机构确实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每年都在防卫方面花费 9 000 亿美元，但每年用于发展的费用仅为 500 亿美元或略多一点。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将 9 000 亿美元用于发展，使人民获得工作机会并从事工商业务，我们或许就不需要在防卫方面花费超过 500 亿美元的费用。到那时，安理会就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就会变得令人喜欢的多，而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从而能够处理希望的问题，而不是对付各种危机。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今天你选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在解决冲突和建造和平方面，我已经提到在所有情形下存在这样的事例，我们通常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机构配合下履行缔造和平的首要职能，以便在法律和适当构架内使工作运转起来；此框架既保护人权也于环境无害。

所有这些都同 2000 年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并吻合，而这些也是我们、秘书长和其他人努力谋求实现的；我们提出了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以实现一个和平和适当的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团聚一堂并确定有必要解决贫困问题。他们出席首脑会议并非抱着同实现军事开支目的相关的目标而来。他们提出，目标是有关人类社会的。让我们使人民行动起来，让我们努力消除贫困、实现增长并给人以希望和生存的资本。

显然，我们在冲突前后要努力做到的是建立国际和地方投资能有所收获的企业环境。先生，你今天在这方面选择的课题令人敬佩。答案不那么简单。投资不是敞开大门就引进来的。它必须在法律制度、政府容量、确立透明的金融体系并同腐败斗争的构架内进行；而所有这些问题在蒙特雷召开的国际发展筹资会议、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世界峰会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等场合均得到提及。

先生，我恭贺你将此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我们世行在此问题上能同联合国机构进行合作感到骄傲。通过探讨冲突根源对冲突相关问题进行审查是一件乐事。冲突的首要原因是失望，而建立商业创造工作机会则能创造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沃尔芬森先生对我讲得客气话。我现在请西门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海因里奇・冯・皮埃尔先生发言。

冯・皮埃尔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今天来到这里并有幸在各位面前发言是我的殊荣。感谢你们给我这一机会并同各位在此富有传奇的会议厅同聚一堂的难忘经历；我对它的了解迄今不过是作为一个好奇的游客获得的。

我应邀就企业在预防冲突、维和和冲突后缔造和平具有的作用讲几句话。我们在西门子公司都知道这不是件容易事。我们在世界范围经营了 157 年，在各类危机局势下运行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今天我要谈及三个方面。首先，我要具体谈一下两个冲突地区，它们目前是公众注意力的焦点，这就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第二，在冲突后重建过程中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第三，为实现稳定、避免冲突或至少削减其强度，我们在长时期内能做些什么？

先是关于阿富汗，我在不到两星期前会晤了到柏林出席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的卡尔扎伊总统。我们的谈话主要注重该国的重建。在他请求下我们一同走访了我们设在柏林的一间工厂；这是阿富汗阿马努拉国王在 1928 访问德国时走访过的同一间工厂。这说明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有几代人的经验，如同我们在多数其它国家那样。

战争打断了我们在阿富汗的工作。战争结束后我们为重新开始我们的活动采取了一些十分具体的步骤并协助重建该国。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恢复经营。我们力求找到一位资深称职的国民重新开始我们的业务；此合适人选我们在自己公司内找到了。他能讲流利的普什图、法西、德语和英语并热衷为国家新生作出贡献。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于 2003 年 2 月在喀布尔重新开设了办事处。

其次，我们认真分析了该国最迫切的基础设施需求。在我们看来，最具优先的是恢复电力、修缮喀布尔的供水系统并重建通信网络。

第三，我们在收到这些部门的订货单时已经在当地铺开了业务。其中一个项目是恢复我们在 50 多年前修建的两座水利发电厂。我们只需从档案中搜寻到最初的修建计划便能够立即开始工作。另一个项目是修复喀布尔的供水系统。需要顺便提到的是，我们利用我们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设施为这项特殊工作培训了为数众多的阿富汗人，在德国只培训少数人。

第四个考虑有关社会方面，他对成功执行项目始终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帮助教育那里的人民。我们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返校”行动，并注重女学童以保证她们也接受基础教育。我深知这些努力不过是开始，但它们随处可见。这很重要。

关于伊拉克，我们想推行同样的基本战略并帮助恢复该国的发电能力、供电网及其通信网络；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还想在当地建立设施，但是众所周知目前那里的局势非常困难。尽管存在安全方面的风险，我们还是开始了具体项目的协助工作。一个是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移动电话网络；另一个是重建电厂。我们都希望能尽快加速伊拉克的重建。

当然，没有哪两个国家或两种局势是完全一样的，也不存在解决所有冲突后局面的灵丹妙药。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局势并作出相应反应。总的讲，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有五个基本因素：安全、基础设施、筹资、冲突后规划和明显进展。

安全是首要因素，这显而易见。这是许多地区存在的棘手问题，而自从 9 月 11 日以来，我们都懂得暴力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世界上已不存在安全避风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显然，企业的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保障和足够政府管制以提供基本法律和秩序。必须将风险因素减少到可驾驭水准，不是没有而是可驾驭的水准。

企业在关键地区的运作要遵循某些基本规则，譬如着重依赖十分了解其国家、文化和当地状况的地方雇员。同样重要的是若干外聘人员推动此进程。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奉行的原则是在志愿基础上派出雇员。

这些人是在考虑到所有宗教、种族和文化因素之后仔细挑选出来的，他们并非一定来自德国。为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必须同地方当局密切合作。首先需要有良好的常识，要审慎、仔细，并且也要大胆。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规定并非始终是足够的。如果风险太大，我们有时不得不撤回——我还必须说，只是在必要时才撤回——因为我们的基本信条是：“我们要留在这里”。

总结一下我的第一个信息：地方政府或临时当局必须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安全；并且工商业应当吸取最了解该国的人的经验。

第二个因素是基础结构。如果没有水、电、粮食、食物供应、交通和通信系统，特别是在城市里，任何事都无法做。因此，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必须是重建和确保这些服务，以便恢复职能当局，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为重建经济和社会奠定基础。因此我的第二个信息是尽快开始修理和更新基本基础设施的进程。

第三个因素是资金筹供。任何重建方案的成功取决于获得资金。私人部门必须有伙伴——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双边伙伴、发展机构、政府和地方当局。工商业无法承担财政负担或是只能承担有限度的负担。我们都知道确保资金筹供的过程可能是复杂的、耗时的，有时候也是令人沮丧的。但是，在冲突后局势中，迅速提供资金是恢复一个可行社会的关键。因此，我的第三个信息就是必须尽快提供筹资工具，包括担保和公共/私人伙伴关系。和平建设进程最危险的因素莫过于缺乏行动。

第四个因素是冲突后规划，首先是及时的规划。只要有可能，需要在军事或解决冲突战略的同时制定冲突后计划。必须要有一个顺利和迅速的过渡。

我们必须报现实态度。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始终希望所有程序都按照我们了解和熟悉的标准形式进行。例如招标进程。异常的局势往往需要异常的解决方法，以及迅速和直截了当的决定。人们必须接受，这样做有时要比按常规办事更加有效，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因此，我的第四个信息就是，尽可能预先制定计划，但在独特的情况下不能浪费重要的时间，依靠过度复杂、过度官僚和耗费时间的解决方法。

如果没有第五个因素，也就是可见的进展，我提到的四个因素都不会生效。人民必须亲自看到取得进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正在改善，他们能够开始再次养家，不是从事法外的活动，而是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对恢复信任和长期社会稳定而言是必需的。因此，我的第五个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让人民获得一个必须很快兑现的未来。

这就使我想起今天我的最后一点：从长远来看能够为确保稳定做些什么？冲突的一个核心根源就是无望，或是感到或被排除在日益增长的繁荣和全球化的利益之外，并被一个人民无法施加影响的进程压垮。这些恐惧，这些绝望的前景造成孤寂和无政府状态。一无所有的人变得不可预料和能够从事任何行为。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趋势，使人民获得希望和摆脱其困境的方法——不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而是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这样做。我谨给各位举三个能够并应当做的事情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教育。我们必须建造学校、教育儿童和为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如果我们教育儿童，我们就为他们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 一个日益繁荣的未来和没有暴力和侵略的未来。正如世界银行总裁说过，人民要为其儿童获得希望。这就是亚洲谚语“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表达的意思。为繁荣与和平进行教育可以是一个公共/私人伙伴关系的广泛方案。

下一个例子是保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必需的，即便在社区同外界隔绝的国家里。有些像远距医学等解决方法提供了更好的健康咨询。这是一个把第一世界带到第三世界的具体和有效方法。

第三个例子就是转让知识和技术。这是把地方经济纳入世界和培训人民进行自助的关键步骤。这样做的方法可以是同全球行动者的地方投资进行协调；这是建立地方商业伙伴和供应商网络和创造就业的方

法。多年前在西蒙·佩雷斯的指导下我们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在西岸的拉马拉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开发商建立了一个合资软件公司。这对我如此重要，以至我亲自参加了拉马拉的开采仪式。你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动人的时刻。该公司运行良好，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个前途。公司发展迅速，直到由于敌对行动的重新爆发而悲惨地终止这一项目。但是，这一想法和许多许多类似的想法能够起作用。我相信这一点。

这些例子表明，发展援助和方案必须并能够做消除贫困以外的许多事。它们也必须注重解决方法，确保长期利益和稳定，并且能够由公共/私人伙伴提供。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教育。

光靠工商界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同公共伙伴一道，工商界能够为了文明、自由和繁荣，对消除暴力、无政府状态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完全同意秘书长刚才说的话，盈利不能同人类的一些主要目标分开：和平、发展与平等。我们正在执行某些项目，并且我们准备做更多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玛尔亚塔·拉西女士发言。

拉西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在本次会议上发言并讨论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我也谨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本次重要会议。

首先请允许我提到联合国私人部门和发展委员会最近的报告，题目是“发扬企业精神：让工商界为穷人服务”。报告认识到私人部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的重要性，包括减少贫困。总之，报告强调了私人部门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坚决相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预防冲突的关键之一。在这方面，必须不断努力更好地调动整个联合国系统。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机构都必须在预防冲突中发挥作用。应该填补体制漏洞，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劳动分工应该允许各机构在各自主管领域内对动荡国家进行互补性的通盘考量。

此外，我们还必须更加彻底地分析各种冲突起因——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起因。冲突和暴力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因素往往具有决定性。克服经济弱点和经济不安全局势至关重要，有助于预防暴力冲突。此外，环境退化也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和冲突。

贫穷的起因和预防与公开暴力行动和复杂人道主义紧急状况的起因和预防在很多方面是重叠的。我们可以将预防活动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长期努力包括进行结构和体制改革，建设能力，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短期措施往往是政治和军事措施，但也包括发展和人道主义措施，以减轻潜在冲突。

今天，人们广泛认为，私营部门负有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首要责任。此外，人们日益认识到，当我们讨论脆弱、容易产生冲突的社会的预防冲突、冲突后和平建设和经济复苏问题时，我们需要让工商界参与，因为工商界是行为者之一。政府、民间社会机构和公司必须建立伙伴关系，采取多方利益有关者做法。应该指出，200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部长们鼓励与工商界——国内和国际工商界——建立伙伴关系的趋势，以提高认识，使各公司认识到如何做模范企业公民、避免助长冲突的消极因素，从经济和社会方面积极促进预防暴力行动。

根据企业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私营部门必须承担起责任，包括在不确定形势下帮助防止和减轻冲突。在这方面，私营公司在冲突过程中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所体现的公司道德规范以及对人权的敏感度都很重要。

今天的冲突往往是争夺开采自然资源机会的行动造成的。如果私营部门向武装团体提供资金，换取自然财富——钻石、黄金和木材，那么私营部门就助长了不稳定局面和冲突。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禁止从塞拉利昂进口没有经过认证的毛坯钻石，这是承认私营部门在冲突中的作用的

重要步骤。还应该指出，某些行业进行了自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建设和平需要巨大的经济投资，需要投资者参与。关键的挑战是，在重建经济过程中，经济复苏的利益必须尽可能惠及整个社会。这种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复苏需要有利环境，创造这种有利环境则需要开展相当大规模的体制建设活动。鼓励私营部门促进地方发展、创造就业和进行基本社会基础结构建设可以促进长期社会稳定，改进地方生活。

然而，不能迫使私营部门在冲突后地区进行投资。应该创造环境，吸引私营部门前往这些地区，促进稳定社会局面。在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期间以及之后，私营部门在创造就业方面尤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私营公司还可以支持处理更广泛的发展和预防冲突问题的社会发展方案。参与建设和平进程的关键方面是地方工商界，因为和平与稳定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必须开展更具体的行动，研究暴力冲突的政治经济问题，查明对冲突非常敏感的各项投资。我们必须促进自然资源收入和采掘工业的透明度，协助加强法治和促进有效执法，打击腐败现象，促进经济多样化，鼓励发展地方工商业，减少价格波动风险。

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如果不能恢复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的努力就会受到严重限制。此外，银行还应该恢复为周转金、固定投资和住宅建设融资。在重大暴力行动爆发之前，金融体系往往已经瘫痪。所有经济行为者都必须参与，必须建立各项基本功能。

近年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发展能力，应对冲突后国家的局势，从而防止人的境况恶化。经社理事会在其工作中继续处理冲突根源。经社理事会今年的实质性会议将集中讨论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在筹备活动中，我们还重点讨论了冲突后国家局势。鉴于这些国家的经历，私营部门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伙伴，它可以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必要时支持经济复苏努力。

我高兴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开始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但是，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还可以共同努力，开展更多的行动，建立全面和更加迅速的反应能力，处理处于特殊情形的国家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中，速度、规模和时间是关键。此外，我们还必须共同制定时间上足够长的长期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预防冲突。

我们相信，建立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将促使本组织采取改革措施，使本组织更加灵便，更加灵活，可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种挑战。我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愿意尽我们的职责，促进加强联合国在这个战略领域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库马洛大使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主持安理会本月工作。感谢你给我机会，在安理会讨论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活动中的作用问题。

早就应该对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和平建设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辩论了。各位成员都知道，我国——南非——本月正在庆祝获得自由十周年。我国争取自由的斗争获得了许多重大的支持，其中包括当地和国际工商界的支持，他们在南非承担了企业和社会责任。一些企业开始雇佣黑人和白人一起工作，令其发挥同样的职能，从而成为跨越我国种族、社会、族裔、政治、经济和区域鸿沟的桥梁。其他工商业为社区组织提供资源，帮助创造社会条件，使人们能够作为邻居一同生活与工作。当政治谈判进程达成政治解决时，南非人民已经认识到在和平中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一些工商企业也准备参与重建和发展方案，创造一个民主社会。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和平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没有和平，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而后者是冲突的重要克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私营部门对发展经济十分重要。

然而，在冲突中，甚至在冲突后重建阶段，私营部门的能力被大为削弱。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主要责任在于国际社会和捐助者。只有和平建立后，私营部门才有施展余地，才能为创造增长与繁荣作贡献。

问题始终是确定私营部门在这些进程中的作用。更何况私营部门不仅包括对和平与发展有积极贡献的绝大多数工商业。从事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钻石贸易的企业也是私营部门的一部分，虽然是一个消极的部分。从事非正规经济行业工作，贩卖小商品和水果的个体商贩，也是私营部门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对国家税收并无贡献。然而，为了这次辩论起见，我们只谈“正规行业”，即对冲突后国家生活有影响的行业。

因此显然，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重建等问题上，光靠私营部门不可能替代国际社会和发展伙伴。但是工商企业确实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能够清楚地阐明和了解这一作用。

让我介绍我们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别咨询小组成员在几内亚比绍和布隆迪了解到的一些经验。

在这两个国家，冲突爆发后赶走了国际私营企业。然而，当地工商企业并无离开本国的选择，它们被迫想方设法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惨淡经营。因为冲突，当地工商企业主面临经济基础设施崩溃，信贷机会有限甚至荡然无存，运输条件不断恶化，能源供应极端困难和其他的生产困难。许多商业最终被迫倒闭，其他则勉强生存。

与此同时，冲突的加剧并不妨碍政府要求当地工商企业提供产品与服务，甚至在冲突期间。这些政府并没有能力根据合同履行义务，结果造成大量拖欠当地私营企业债务。当这些国家的冲突开始结束后，新政府当务之急之一是寻求援助，解决欠当地企业的债务。国际社会必须找到办法协助新政府履行还债义务，以避免企业大规模破产，造成这些冲突后国家失业和商业基础萎缩。

解决政府对当地企业债务问题，还可为经济注入迫切需要的资金，使企业能够扩大业务和利用恢复和平与稳定带来的新机会。为因重建和冲突后方案而被迫解甲复员的士兵提供就业机会的往往是当地企业。完成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的任务，必须有一个有一定的规模且坚实的地方经济吸收复员军人。

而且，一个健康的当地私营部门是吸引国际私营部门到冲突后国家投资的必要条件。更坦率地说，如果当地企业不在本国投资，外国企业也不愿来投资。当地工商企业与国际工商企业伙伴合作是建立对冲突后国家信心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推动经济增长，有助于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成功。

在创造政治环境，使私营部门能够营业方面，国际社会的作用最重要。利润是商业的动力，商业运作需要和平与稳定。而达此目的的最佳途径是国际社会携手努力，明确承诺维持和平，在冲突地区部署维和人员。

双边和多边鼓励措施，如投资保障和借贷政策，可刺激经济活动。然而，这些行动和手段必须适合具体局势的需要。在几内亚比绍和布隆迪，根据我们在两国会见的私营部门代表指出，重点明显是由国际社会向两国政府提供预算支助，使国家能够还清国家在冲突期间对私营公司欠下的合同债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本迈希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我首先感谢德国代表团建议讨论本项目。这一问题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重要性绝对明确。我也欢迎世界银行行长和西门子公司总裁，感谢他们的发言。

安全理事会在大会审议有关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最后报告后第二天即审议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说明本组织及其主要机构对此问题的重视。

金伯利进程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重要贡献，它代表一个重要的道德进步，应该得到我们欢迎。该

进程的主要内容是钻石业承诺实行自我管制，以及钻石业以伙伴合作精神已欢迎钻石生产国打击钻石非法贸易——及血腥钻石的倡议。此类钻石助长若干冲突的作用已被充分揭露。我国代表团赞扬金伯利进程体现秘书长向工商界提出的《全球契约》精神。

人们今天广泛承认，在冲突地区，国际公司或较小公司的做法对尊重人权与破坏和平往往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同政府或同反政府的社会团体有联系。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讨论。这里我想侧重目前工商界在冲突后缔造和平方面的作用。在这种局势中，爆发冲突的根源大多继续存在，需要尽快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加以解决，才能建立持久和平。

从正摆脱冲突的国家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紧急重建阶段结束时——该阶段一般仅限于满足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要以及协助建立保障法律安全所不可缺少的体制和立法机构并创造有利于投资的气氛——国际社会面临着缺乏大量投资的问题。这种投资是导致持续和持久增长的唯一条件，而这一增长仍然是持久和平的最佳保障。

简单地说，各公司企业是应该置身于有关政府所领导、在联合国和多边金融机构援助下开展的创造条件和恢复基础结构的经济复苏努力之外？还是应该按照其日益遵循的社会责任原则参与这些努力？

安理会议程上许多局势的冲突后发展，尤其是非洲的局势发展，都清楚说明私营公司应该早日参与。的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工作尤其突显了观望态度的危险。该小组最近提交了其关于几内亚比绍问题的报告，而在布隆迪情况中，它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障碍。

我国代表团认为，非洲人自己提出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倡议恰当触及了作为消除武装冲突危险所需一个要素的和平与发展之间联系的问题。新伙伴关系所采取的办法是以伙伴关系思想为基础的，它最优先重视通过强调妥善政治和经济治理概念——包括企业管理概念——以及责任义务、打击腐化和尊重人权，创造有利于投资与商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发展的动力。

现在，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通过八国集团在卡纳纳斯基斯和埃维昂举行的首脑会议，对新伙伴关系作了积极回应，使它成为这一办法的一块基石。它应指导私营部门对国际社会建设和平的努力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这一办法的成功取决于冲突后国家政府随之落实和尊重它们所作承诺——这些承诺常常是可以核证的——的情况以及必要数量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提供和私营部门投资的帮助。在这方面，人们尤其期待多国公司作出贡献，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能具体体现社会责任理念的大胆倡议，来减轻国家危险。

张义山（中国）：主席，我首先要感谢你倡议举行此次公开会议，我同时还愿意欢迎安南秘书长与会讲话。我也要欢迎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西门子公司总裁冯·皮埃尔先生、经社理事会主席和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库马洛大使参加今天的会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许多企业的业务已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在一些情况之下，企业的行为对冲突地区的局势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如何推动和促进企业在冲突国家和地区的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为此，我愿意提出以下看法和主张。

首先，企业应该模范遵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以及其它行为规范。在非洲一些冲突国家，有些企业唯利是图，不顾安理会决议的规定，进行钻石和木材等方面的非法交易。这种非法贸易往往助长了当地的武装冲突，损害了有关和平进程。此类活动必须予以制止。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并赞赏“金伯利进程”为切断钻石非法交易与武装冲突之间的联系所作出的有益贡献。毫无疑问，企业加强道德责任感，提高行业自律性，严格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对于防止冲突升级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企业应积极参与复员进程和冲突后建设和平。冲突之后，有关国家或地区百废待兴。企业积极参与当地的经济重建，既可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又可帮助冲突后国家恢复经济，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前战斗人员能够重返社会。这对国际社会和当事国政府实现稳定、巩固和平成果的努力将起到有益的补充。

第三，企业可以为预防冲突作出积极贡献。纵观当今世界，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冲突的根源不尽相同，但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经济欠发达密切相关。企业应积极赴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当地人民消除贫困，提高经济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起到预防冲突的作用。

主席先生，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联合国、地区组织和各国政府无疑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同时，企业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应该鼓励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积极为预防冲突和促进冲突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赞成由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等机构就此进行进一步探讨。

莫措克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德国提出的召集安理会本次公开会议的倡议值得高度赞扬而且也是适时的。的确，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安全是冲突国家实现稳定与安全的关键，也是确保可持续和平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有具体证据表明，工商部门的作用是与《宪章》交付给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密切相关的。第 1366（2001）号决议明确指出了预防冲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补关系。它确认应该优先重视贫穷和缺乏发展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冲突的重要根源。我们都同意，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私营部门的活力以及国际私营部门行动者的参与。

本次会议极其有助于安全理事会成员加深其对工商界和私营部门在冲突不同阶段——预防、解决、冲突后稳定和重建——实际发挥或可以起到的具体作用的了解。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欢迎秘书长参加这次辩论并作了开幕发言。我们还欢迎世界银行行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以及西门子公司总裁前来参加会议。他们令人高兴地提出了丰富的意见。

经济因素在国内冲突中的作用直到最近一直被忽视。各种冲突解释比比皆是，它们都强调敌意、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操纵一切的政客。然而，安全理事会处理的许多局势都表明，混淆经济议程在造成冲突和阻碍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只会起反作用。

有时在安全理事会决策过程中，易引发冲突的经济议程得到了相应处理。制裁制度和独立专家小组的活动也涉及到因经济动机而滋生的若干冲突根源。金伯利钻石认证进程就是其最近的一个范例。

现在应该加强在管理经济因素这一冲突来源方面积累的经验。因此，秘书处可以编撰一份报告，强调现代国内冲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层面的重要意义。报告主要部分可以详尽阐述冲突后变革的政治经济问题。企业界的参与可以在这个冲突阶段显示真正强大的积极内涵。

的确，企业和私营部门给冲突后重建与发展的政治因素补充了一个经济层面。应该采取多项措施，而且还需要回答各种问题。我们的德国同事已在筹备本次会议过程中分发的非文件中提出若干问题。我将努力扼要阐述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全球化促使多国公司在全世界投资。在作出投资决定时，收受国或许会受到冲突的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公司总是从长远角度看待其财务表现，看待其良好企业公民的自我形象，以及在各自国家促进经济发展问题。罗马尼亚最近自身经验表明，可持续的投资和贸易是向法制和有效市场经济顺利过渡的重要因素。

首先，我要指出，毫无疑问，企业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立法环境。例如，在当今非洲，人们日趋认识到，曾经被视为国家保留的若干领域如果要吸引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需的资本和管理技能，就必须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但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目前引资额还不足发展中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前面的挑战是创造有利企业环境，提供吸引投资者的便利条件。

第二，外国公司本身应该通过其一切活动创造稳定。私营部门必须作为可靠重要伙伴参与各自国家的发展进程。公司的社会责任目前已得到许多国际宣言和公约的认同，这些宣言和公约都强调企业可在冲突受害国国内发挥作用。

第三，地方私营部门也需要得到帮助，它们在投资战争经济或被战争经济完全摧毁后，可能已被削弱或歪曲。

第四，无论地方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必须在自己活动范围内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维护尊重人权，从而为防止和克服冲突作出直接贡献。企业实践决不能参与侵犯人权，也不得以任何不适当方式卷入地方政治活动。

第五，联合国系统应该在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阶段展示理解，并给要求外国企业在进入或重新进入一个国家或市场时承担的责任提供适当支助。应该在国家和国际两级适当考虑把奖励和规章适当结合起来，以便促进良好的公司管理。必须以更加系统的全球贸易和商业管理和提供更有效的机制，补充旨在防止和解决冲突的常规外交干预和军事干预，以确保在脆弱国家内负责任地管理资源财富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区域为基础的缔造和平和冲突后重建办法应该从安全理事会起吸收企业，把它作为一个基本构件。许多现代国内冲突都有强大的区域经济联系。最顽固的冲突经济经常就是那些在各种区域冲突形态中根深蒂固的经济，例如西部非洲和大湖区经济。

国际和平学院最近一份关于区域范畴战争经济问题的项目报告指出，不仅区域冲突综合现象的政治经济问题被建设和平者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使得许多战患国很容易陷入持续不稳定和贫穷。

最后，应该以更开阔的眼界——即在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公共和私营部门行动者和机构之间进行系统协调——对今天辩论的结论采取后续行动。各主要利害相关者之间的有效合作与互动就是确保任何国家在强烈主人翁意识基础上成功执行任何经济或政治战略的途径。罗马尼亚代表团随时准备同德国和其他代表团密切合作，确保对今天辩论采取适当后续行动。

穆尼奥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德国主动就私营部门——人们的理解是，这不仅指的是公司，而且还有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重建方面的作用问题召开本次有各位尊敬客人参加的公开辩论会。我认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曾对各国的国内进程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大家都十分清楚促使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强权统治世界广大边远区域并强行建立基本旨在为殖民中心而非地方人口谋福利的政权的商业动机。过去，许多公司都曾同它们的政府一起从事活动，强行建立针对外国市场的生产模式，分割和分裂人民，并给少数族裔提供福利。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复杂的后遗症，人们今天仍感受到其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局面从殖民统治演变到大公司控制。过去50年来，在发展中国家从事业务活动许多公司都是破坏地方政府稳定的主要行动者，也是在其各自政府支持下资助和支持国内冲突某些部门的元凶。因此，举例而言，我作为智利人从未使用过所谓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服务。著名公司的特别利益同其母国外交政策相一致，这种局面显然随着全球生产时代的来临而有所改变。

在其他发言中提到了某些公司促成的那种类型冲突的例子，包括导致金伯利进程的西非钻石问题，以及对刚果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在两种情况中，这种开采都资助了参加战斗的反叛团体。此外，参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贸易和贩运的私营部门，在冲突承担着相当大的责任。需要制定适用于这种公司活动的行为守则和监测标准，以避免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肆意、甚至是非法的泛滥。

诚然，各个公司既不是慈善性的、也不是维持和平的组织。它们是实现繁荣的推动力量。我们如何能够调和企业部门合法的创造利润的目标及公民社会和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目标与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重建的任务？

全球市场经济的稳步增长及其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进程，造成向私营部门的大规模资源转移以及对新生市场的投资的大量增加，然而其特点常常是管制和施政方面的严重的结构脆弱，以及高度的贫穷、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和相当程度的腐败。

此外，当代冲突的性质日益具有国家内部的特点，改变了对冲突预防和解决的做法。其复杂性需要采取多部门的办法，其中还必须对企业、特别是最大的跨国企业留有相当大的空间。为此设立了各种机制。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通过了《多国企业准则》。秘书长今天回顾，他提出了《全球契约》，各公司应据此在其特别是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活动中实行国际劳工组织、人权和环境方面的原则。

广泛定义的私营部门如何能够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重建范围中采取行动？我要概述几点设想。在预防方面，毫无疑问，私营部门由于就在当地而且熟悉其环境，能够在看到即将出现冲突的迹象时提供早期预警。它然后就能够通过制定预防或减轻冲突战略而进行合作。

各个公司需要稳定；需要可遵循的明确规则。冲突毕竟伤害公司的战略利益。这意味着能够在企业同联合国的工作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要企业部门拨出资源用于社会投资、加强当地的公民社会以及在推动容忍、多样化和公民教育的社区和活动中投资，在预防中就有一种更具体的方面能够适应企业部门。很多有远见和先进的公司已经在这一方向上努力，但我认为仍需做大量的工作。

在重建方面，各多国公司能够同其在当地的伙伴们一道采取很多措施，以汇集广泛的经济部门并辅助联合国的重建努力。

各公司还可对直接影响生产的项目提供财政支持，例如通过为前战斗人员提供工作的方式。常常正是由于前战斗人员没有工作而使冲突再次出现。

从施政的角度上讲，私营部门可以通过至关重要的政府决策能力而在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确保其在当地更实际和有效并为社会提供广泛利益。实际上，还有可能探讨对等捐款的想法：例如在像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方面，以等同于捐助国政府的捐款的数额来共同资助一个重建项目。

在企业的情况中，无疑应当展开广泛的行动以鼓励公司在冲突接近时留在该国，或采取有关的预防和重建措施，或在重建阶段介入该国。例如，有多少公司准备在海地提供工作和希望，以及同时在一个需要这种帮助的国家中赚钱：这个国家接近主要市场，而在那里通过培训可发展一支高质量的劳动大军。

最后，鉴于私营部门和冲突之间的内在关系，秘书长应该就该议题拟定一份报告，或许就预防和冲突后重建提出建议，可由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用以在今后的和平行动中执行。我认为，这是值得做的。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极为感兴趣和高兴地参加根据你的倡议而举行的使我们大家今天聚集在这里的辩论。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并感谢世界银行总裁和西门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及我们的同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主席的发言，它们促进了我们的讨论。

国际社会通过这种讨论来深入分析其为企业在危机和冲突中的作用所采用的准则，是很好的想法。我提到，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理论，一套在各项宣言、决议和各国际机构采取的行动中所载的条例和原则。我想到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和 8 个工业化国家集团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方面做了什么，在欧洲联盟的《绿皮书》范围内做了什么，世界银行正在做什么——这些活动都值得最高称扬。我还想到秘书长在 1999 年发起且今天上午提到的《全球契约》。

安全理事会也在几方面考虑到私营企业在冲突爆发及冲突管理方面的作用。这很自然，因为是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即使极少是明显的——形成了我们做出的很多决策的基础。

就安全理事会而言，我指的是专家小组所做的一切，它因强调非法开采自然资源是某些冲突中的关键因素而做出巨大贡献。我还想到各种制裁机制、目标明确的制裁和禁运，特别是安理会实行的武器禁运。这些措施的目的常常是使这些将从冲突中牟利的人丧失其罪恶勾当的果实。最后，我想到为了通过金伯利进程消除钻石贸易而建立起来的富有成效的合作。

然而，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这也是我对这一辩论感到满意的原因——是分散的。这些措施大都在个案的基础上作出反应。因此，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我们是否需要走得更远？以及我们如何走得更远？

关于我们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正如在本次辩论中普遍强调的，在经济因素和危机局势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互动。正如今天上午所说的，在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和冲突后局势方面，我们能够努力走得更远。我认为——今天上午也有人这样说——参与旨在维持或重建稳定与法治，并且协助各国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行动，也符合商业的利益。我还认为，我们需要铭记——我这里尤其指的是西非正在发生的一切——非洲的冲突经济现在经常具有区域性。

如果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问题是我们如何做？我国代表团要表示赞成人们已经就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和冲突后局势所说的话。

关于预防冲突，世界银行行长所说的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赞成他的观点，即给人民带来希望是预防冲突的最佳途径。他说，让他们就业，给他们机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世界银行行长今天在这里出席安理会会议。我认为，在大部分基本上属于预防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情况中，有可能在我们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进行重要的合作。

我认为，秘书长 1999 年全球契约倡议正符合这些方针。如果商业在人权、国际劳工法、不参与非法开采自然资源或非法贩运武器等领域中遵守主要的国际标准，这只会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健康经济和资源，并且预防危机局势。

关于冲突管理，我要提两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是关于一个我认为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一个我们在这里不能袖手旁观的问题。这就是在采取与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维持和平有关的行动中使用私人企业，而这些行动传统上是国家的责任。我认为这种做法有时候过分或者失控。

我要发表的有关冲突管理的第二个看法是：国家有责任——也许各国并没有都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有效地这样做——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商业中的个人根据实行的禁运行事。我们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实行禁运，但这些禁运措施却遭到蔑视。各国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禁运得到遵守。

关于冲突后局势，西门子公司总裁在使私营企业能够进行干预所必需的五个因素中首先提到安全问题。这是清楚的；这是一个常识。我们在这里每天注意到这一点。必须使私营部门企业参与在冲突后重建进程中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在有关国家的公共部门中推广某些国际准则，以及更普遍地说，通过这些国家的经济调整，包括正如我相信经合组织所计划的那样开展由多国企业发起的活动。最后，并且更加具体的

是，私营企业能够在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重新安置方案中提供帮助。

我认为，大家都清楚，对危机后局势中的有关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建立有利于商业和地方私营部门发展的框架。在这一方面，各国际组织，特别是各联合国机构和布雷顿森林机构能够并且应该为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和在冲突后局势中加强国家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作出贡献。

我想知道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优先事项应该是什么。我认为，第一，除了监测制裁的执行情况的机制外，安理会使其在冲突地区和危机局势中重视经济因素的方法制度化将是及时的。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方法是否应该是建立一个利用独立专家的机制，其任务是监测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活动和非法贩运在助长武装冲突中的作用。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每天极为关注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并且应该有系统地努力打破我们在许多危机局势中看到的非法贩运、尤其是毒品和有组织犯罪、施政不善、以及因此这些旨在确保社会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制度混乱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在制定我们的任务方面正取得进展，我们应该继续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

概括地说，这些行动建议也许能够有助于发展私营经济世界和联合国中那些努力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饶有兴趣地等待我们早些时候听到的秘书长设立的机构间小组的报告。我国代表团愿意审议安理会可能在其权限范围内采取的后续行动。

西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企业是珍贵的发展伙伴，它们提供极为重要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正如联合国私营部门与发展委员会所重申的，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反过来减少贫困并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在关于工商界作用的讨论中应探讨如何促进经济自由和创造让私营部门增长繁荣的环境，因为这才是工商界的作用。冲突为工商界所憎恨。在有冲突的地方，增长和机遇丧失殆尽，工商业萧条。各个公司在促进和平，使之成为增长和市场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有着真正的、永久的利益。

但工商界同政府在预防冲突、维和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责任不同。我们今天的讨论对此应加以区分。

公司可通过良好企业公民意识的榜样提供领导。公司在很多方面这样做了。有些公司还通过了企业行为守则；其他的公司选择参加企业行为方面的自愿性国际守则。公司代表的是我们对一个日益繁荣与和平的世界共同看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公司作为良好企业公民提供了杰出的全球性领导。在世界很多地方，它们的所作所为正在被其他公司所采纳。国务卿的企业杰出表现奖，所表彰的是美国工商界作为良好企业公民在海外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2003 年，Chevron Texaco 公司因其在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之一、尼日尔三角洲致力于良好企业公民意识和重要的发展与减贫方案中进行投资而受到表彰。美国钢铁公司因其对斯洛伐克人民的经济、公民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积极影响而获得嘉奖。当利昂·苏利文于 1997 年制定苏利文原则帮助结束种族隔离时，他认为工商界、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变革的最有效的途径。

联合国的《全球影响》立足于促进人权、劳工权利和环境责任的 9 项社会正义原则，确立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进程。美国支持《全球影响》的自愿性做法，这一做法促进各公司、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劳工和民间社会一道在自由与繁荣的范畴内促进人类的尊严。

美国一向支持集中处理冲突局势中的工商界的政策机制。美国-联合王国安全和人权自愿原则伙伴关系促情工商界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设法确保公共部门和私人安全部队不再重犯过去违反人权的行为。我们还建议，各公司应采取措施确保提供给安全部队的设备只用于防御的目的，私人不参与军事和执法活动。

根据因特拉肯进程和安全理事会第 1459（2003）号决议，美国积极支持了金伯利进程。这一多边努力借助于各国政府、工商界和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制定粗金刚石的核证国际标准。这一进程将大大减少冲突钻石买卖的机会。冲突钻石给整个非洲带来过巨大的不幸。

美国还支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多国企业准则和道德标准，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我们在制定经合组织的《反贿赂公约》和 2003 年八国集团关于反腐和增进透明度的声明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正在通过《非洲增长和机会法》创造市场机会。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显示了贸易在让人民脱贫方面的能力。非洲增长和机会法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在快速增长，整个地区都受惠于这一增长带来的好处。用乔治·布什的话来说，“从毛里求斯到马里，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正在帮助改革旧有的经济，提出了善政方面的新奖励措施，给千百万非洲人带来新的希望”。

加斯帕而·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及时召开这一会议，讨论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我欢迎秘书长的开场发言。他的发言中提出了安全理事会应仔细考虑的若干主要问题和今后工作的议程。我还感谢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西门子董事长兼总裁海因里克·冯皮埃尔先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玛尔亚塔·拉西大使以及刚刚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特设咨询小组主席杜米萨尼·库马洛先生的出色的发言。

德国主席提出的这一倡议应予表扬，因为这一倡议是让私营企业参与在安理会议事厅讨论通常和主要是由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有创意的做法。

大家总的都认为有必要建立新伙伴关系，以便加强努力调集更多资源实现商定的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提出的目标。作为受冲突、贫困、疾病和经济边际化影响程度最深的国家，非洲国家应站在努力的前列。秘书长提出的《全球影响倡议》、2002 年蒙特雷发展筹资会议通过的宣言、八国集团的首脑会议、联合国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都说明，对额外资源的需要，仍然像大会在 1990 年代通过《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时一样重要和紧迫。我们欢迎联合国努力促进全球伙伴关系，我们并鼓励良好企业公民意识，因为我们认为无法仅仅通过国内资源或官方发展援助满足非洲发展、特别是刚刚摆脱冲突局势国家的发展方面的资源需要。显然，如果没有重要的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要对付冲突后恢复和重建造成的长期挑战将会长期存在，这些国家将再次面临它们陷入冲突的可怕局面。因此，如果国际社会要对持续和持久和平作出真正的贡献，就必须作出认真和果断的努力。

预防冲突的主要责任在于面临政治和社会危机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种社会力量。但预防冲突也是一种联合的努力，涉及国际社会，包括国际、区域和分区组织、国家、工商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企业部门尤其是在这里由西门子公司代表的大型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应该予以强调。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它们对规划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影响的多数国家的发展产品成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认识到它们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它们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

大型公司在我们一些国家中的存在往往具有几乎是垄断的地位，但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与促进稳定利害攸关。为此，它们应该在交易中采用最佳的国际做法，不是光从利润的角度，而是还应该为了促进它们在其中营业的国家的健全发展来看待工商业。不幸的是，我们从过去学到的经验教训没有显示出这种美妙的理想。我们往往看到大小型企业助长了分裂和冲突势力。

所幸的是，最近我们目睹了重要的变化过程，我们往往看到大型公司作为沟通和进步的积极力量行事。在这方面，今天上午在本会议厅经常提到的而且

我国在一开始就充分赞同的金伯利进程，显然表明了通过涉及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公司在预防冲突中的伙伴关系能够取得哪些成果。在这方面，我们还欢迎大会于昨天通过了有关加剧冲突的钻石作用问题的决议。

要恢复战争所破坏或使之无法运作的设施，要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重新融入社会，要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并同时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支持这一进程，国际私营部门不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任务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上星期已经向安理会简报了最近在柏林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国际社会在会议上重申对该国未来的承诺。会议明确表示在政治上予以支持，并在今后三年内提供大约 82 亿美元用以资助阿富汗的重建，其中第一年可动用 44 亿美元，因此柏林会议是国际社会可如何有效地协助脱离冲突的国家的典范。类似的举措也适用于处于冲突后局势的其他国家。

我要借此机会提请安理会注意我国冲突后的局势。我们意识到，建立一个有利的政治和机构环境，是促进经济生活和创造有利于私营部门健全运作的关键因素。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安哥拉果断地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通过了若干项有利于工商业的立法措施，以便逐步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和追究责任制度。请允许我提出这方面的一些实例。安哥拉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用数据公布系统，以便使关键的经济数据更加透明，并加强其追究责任制度。最近还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非洲同侪审查机制。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消除贫穷战略，用以加速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我国更有能力进行对话，并与国际社会建立有意义的重建我国的伙伴关系。我国已邀请并呼吁国家和国际工商界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为我国经济注入它们特有的活力。这将具体促进在冲突后非洲国家之一中巩固和平、稳定和国家重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安全理事会最近在管理和结束漫长的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里并不是对过去作出评判的场所。与此相反，我们必须展望未来，吸取经验教训，并确定安全理事会可以如何成为有力工具，在建立联盟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这一联盟中，例如西门子公司等公司应该有能力正确地面对给与希望和使人民看到未来的各种挑战，并建立一个和平更为广泛但较少武装冲突的世界。

阿德奇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安排了这次辩论，讨论工商界在防止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返回非洲的投资达到了过去五年期间的最高比率，约达 25%。这一统计数据会使我们认为，世界该地区正在大量吸引私人投资。但情况并非如此。投资者依然小心谨慎，这是因为武装冲突扩散和持续不断，以及随之产生的后果即无视法治。冲突妨碍了投资。某些投资者的举措和行动也使冲突持续下去。过去十年表明，冲突持续期、轻武器非法流通、非法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侵犯人权行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以经济因素流动为特点的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私营部门已证明是全球行动者，它们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各级的治理活动。

冲突中国家的特点，是它们的各种机构日渐变弱，甚至瘫痪。私营部门的贡献会受益于界定明确的调节框架。此种贡献不可取代国际社会负有的责任，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责任。

应当迎接的挑战主要如下。我们如何摆平私营公司的社会责任同有必要制定刺激措施之间的矛盾？我们如何在和平、发展和平等的理想同企业部门追求利润和生产效率的首要原则之间找到平衡？我们还必须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私营部门是否有能力在预防冲突阶段就对建立并巩固民主和良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因为缺乏这两者通常导致冲突。

总的讲，私营部门的存在在非洲仍然薄弱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部门和国家求生存。在私营部门

和国家都薄弱的环境下，我们又如何同外国私营公司确立平等和建设性伙伴关系？此外，我们又怎样加强国际合作和政治意愿以便执行针对那些在冲突地区作出不负责行为的个人和私营企业所一致达成的强制措施？我们又怎样使这种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尽可能全面和包罗万象？国际社会正越来越多地对摆脱冲突和陷于冲突的国家给予特别和更大关注。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这种做法不致危害那些努力防止冲突并维持和平和稳定的国家？在这方面，最不发达国家的处境值得人们给予更多关注？它们极为脆弱并容易遭受破产。最后，我们还必须向自己提问的是，如何能使私营部门参与为冲突后重建所采取的综合、多部门步骤。

我在这方面要回忆 2003 年 3 月在阿布贾举行的西非洲商人论坛。其目的是为西非商人提供一个考虑他们如何参与执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论坛并确认私营部门能够成为西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考查私营部门如何为确立西非洲持久和平的努力作贡献的进程。我回顾这一努力为的是强调指出虽然私营部门在短期内介入冲突后重建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它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更广阔途径的一部分并考虑到冲突的社会经济原因，这样做则缺乏连贯性。

有关我刚才既要提到的难处，我们以极大兴趣等待着秘书长设立的机构间小组发表其报告，以便审查报告提出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考虑到时间已晚，我仅吁请所有成员尽量简短，因为如果我们在会议结束时还有足够时间请我们客座发言者对各种建议和可能的问题作出答复，这将对所有人都有利。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听从你提出的作简短发言的请求恐怕来得迟了些，但是我还是尽量做到。

我们感谢德国在担任主席期间提出就企业在预防冲突、维和和冲突后缔造和平方面的作用举行这次公开会议。我们欢迎秘书长的发言，也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拉西女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西门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先生以及库马洛大使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设非洲摆脱冲突国家执行小组主席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秘书长的开场白为今天的会议定下了基调，其他与会者的发言也提出了十分有益的见地。

虽然维护和平和安全是国家的首要责任，但是如同秘书长指出的，企业同和平环境也息息相关并且能够在冲突局面、尤其是冲突后重建中发挥重要支助作用。

今天的世界已经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国际商业交往在影响各国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经济和政治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世界经济占世界资本和技术，乃至工作机会的较大份额。大公司的净价值和销售额通常超出小型甚至是一些中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跨国公司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具有重大影响。其影响程度同既定国家的大小呈现反比例增长，而却同一个国家的经贸体制开放程度、特别是它在出口和增长方面依赖原材料和农业的程度呈现正比例增长。这样，跨国公司和企业在积极和消极方面都具有相当潜力，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那些在过去几十年表现出强劲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恰恰是那些受益于大笔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这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业实现，而不是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后者迄今是有限的。但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仅限于几个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去年，全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70%仅发生在 10 个发展中国家。

遗憾的是，包括跨国企业在内的企业战略与运作决定的首要确定因素——即企业收支平衡表的底线——并不始终同有关国家的国民经济、社会和政治目标相一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卡塔尔和大型跨国公司对价格进行的结构控制。几十年来，这是

逐渐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及其社会经济状况下降的主要原因，它激化了国内社会和政治紧张进而导致世界许多地区暴发冲突。世界银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那些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比那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更容易暴发武装冲突。这具有讽刺意味。

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增长的债务问题方面采取的不灵活已经造成财政资源稳定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净流失现象。去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财政划拨为负 1 920 亿美元。而去年这些国家的债务还本付息总额高达 3 40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仅为 740 亿美元。

不幸的是，还有某些直接行动促成了冲突的爆发。秘书长提到生产和提供在多数武装冲突中使用的武器硬件的私人企业。这些是真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为糟糕的是，这些肆无忌惮的企业为了支持民兵、派系和军阀而开采自然资源，以便获取盈利和保护其投资。几个联合国专家小组得出结论，交战派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钻石和其他矿产，支撑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冲突。

大会通过了有关钻石助长冲突的作用的各项决议并支持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是很重要的，不仅打破了武装冲突中非法钻石交易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加强了有关企业必须在冲突局势中奉行对社会负责的政策的辩论。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有关企业在冲突局势中作用的研究指出了企业能够在冲突局势中支持和平的以下五种方法：第一，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促进经济发展；第三，接受责任制和支持法治；第四，建立一种成为其工作社区一部分的想法；以及第五，从事第二轨道外交。

对自愿行为守则是否充分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辩论，例如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或是秘书长的全球影响倡议，以确保企业的人道主义责任。多数人认为，这种自愿守则尽管是崇高的，但不是对遵守的巨大奖励，借以消除不遵守的财政动机和不严格实施这种守则的情况。巴基斯坦同样认为，企业采取的自愿守则虽然宝贵，但常常是不充分的。因此，我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企业的活动可以受到一个更有效框架的管理，不仅规定责任和权利，而且也确保企业的责任和责任制，不仅包括对企业法律权利的尊重，而且也包括对公民和所涉社区的法律权利的尊重。

这样一种框架的基础可以是《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尊重。可以通过联合国在蒙特雷合作进程中发展这一框架。它可以包括密歇根研究提到的五个领域。它可以涉及冲突每一阶段中企业的行为。它可以确保商业交易的透明度。它可以规定可能的纠正措施。最后，它可以包含一个最为宝贵的监测机制。

沃尔芬森先生今天上午早些时候说道，冲突的根源是缺乏希望，并且企业能够通过创造就业带来希望。我们认为，国际企业能够对促进和平与安全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积极和有意识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均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国际企业能够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来这样做，例如，首先通过国际投资保证制度等手段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把外来直接投资放到发展中国家更广大的阶层中，特别是其中最贫穷的人；第二，对最贫穷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减债立场；第三，调整企业战略，把原料加工放在生产国；以及第四，支持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更大贸易机会，特别是消除歧视性的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并改革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农业补助和支助制度。

最后，请允许我再加上另一个想法。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国际商业中的获利达到数千亿美元世界 50 个最大公司每年的总销售额为 20 000 多亿美元。这些公司和机构能否考虑把其纯利润的 1%用于最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也许通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管理的一个国际基金这样做？这将是对发展的具体和直接的贡献，并且是对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冲突后重建的间接贡献。一些公司已经在这样做。这是否可以成为所有公司的准则，从而创造沃尔芬森先生提到的就业和希望？

用秘书长的话来说，我们不是要公司做同它们正常商业不同的事情。我们要它们以不同方式从事商业。

伊萨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全球化使工商业不仅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行动者，而且也是全球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千年宣言》的规定，联合国同工商业之间伙伴关系的扩大是我们时代的必需，应当加以鼓励，只要这种合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首先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并且是互利的，有助于加强本组织的权威。

我们正是在这一广泛的背景下看待德国关于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讨论工商业在冲突地区的作用的倡议。安理会的辩论增强了这一问题的政治意义，并且通过安理会处理在几个非洲国家的危机和其他冲突的经验丰富了这一问题的内涵，它的讨论设法帮助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制定综合方法，为了发展的利益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联合国系统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交往。

至于企业界同联合国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和平建设方面的交往，一个有系统的出发点可以是这样的事实，即正是企业界必须支持和补充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努力，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另外，必须在同私人部门进行的对话中制订这种交往的参数，考虑到其本身的具体方法。将于 6 月 24 日举行的全球影响领导人首脑会议可以是阐述这种方法的有用的论坛。此外，也许可以在联合国区域经济委员会范围内举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通过召开联合国代表和感兴趣的企业界之间有关面临危机的分区域和具体冲突地点的单独重点的讨论，这样一种对话可以是更加实质性的，并同今后的实际任务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这一想法在原则上是令人感兴趣的，在一些冲突地区，企业将采纳自愿的自律制度，这种制度将促进避免冲突和解决冲突后果。

在冲突地区，在正常情况下指导负责任企业行为的公认原则——例如尊重人权和不参加不正当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不参加可能侵犯人权和破坏两性平等的活动——尤其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借助全球契约框架内已经奠定的基础，借助金伯利进程获得的正面经验。

但是，以纯道德标准和公认原则为基础的自愿自我克制措施本身显然并不是灵丹妙药。因此，必须同时接受现有国际法律原则和准则的制约，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预警和预防冲突技巧和机制，这些技巧和机制已经证明它们是行之有效的。

关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它必须首先处理创造必要政治条件的问题，以便利用工商界促进冲突后和平建设的积极潜力。在这方面，务必保证必要的透明度，并且为外国公司在从事冲突后建设的国家市场开展活动制订明确和容易理解的规则。这些规则和程序必须建立在政治中立、平等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基础上。

一个有希望的领域是加强安理会与布雷顿森林各机构之间的互动，以促使这些机构及时参加冲突后建设活动；反过来，这又将为私营部门参与和平建设各方面活动创造有利环境。

梅嫩德斯女士（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预防行动以及一般而言维持和建设和平活动需要采取全球做法，这种做法要求以联合国、各区域组织、受影响的国家政府和各邻国以及民间社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参与，正如大会去年夏天通过的关于预防武装冲突问题的第 57/337 号决议所强调指出，民间社会必须随时发挥重要的支助作用。

我们所有人都同意，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建设民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善政和法治是正常状态，经济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在这方面，民间社会的作用非常重要。经济稳定是巩固任何和平进程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因此，实现经济稳定是一项重要目标，当局必须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民间社会——特别是工商界——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建设进程，当局和民间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实现经济稳定目标。国际社会必须酌情给予支助。

此外，工商界不得促进支持某项冲突的国家的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公司遵守联合国实施的禁运措施，例如，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343(2001)号决议。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提出这一重要问题，感谢在今天辩论中发言的各位人士。显然，私营部门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冲突地区是工商界面临的特别具有挑战性的环境。秘书长发起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制订了各项原则，以帮助工商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减少冲突风险，应该祝贺秘书长采取这项行动。联合王国高兴地为全球契约提供了资金。

关键的问题是，工商界如何在冲突局势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希望商业活动至少不会使冲突恶化。但是，正如世界银行行长指出，工商界可以而且确实为发展和经济繁荣、创造就业和希望作出了积极贡献。这确实是关键问题。然而，工商界也可以帮助建立法治，例如获得投资、确定财产权利、达成契约和制订一套商业法律。而且地方工商界领袖人物显然可以发挥作用，改变他们生活的社会。

关于最佳做法，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为工商界如何在冲突地区开展活动拟定了具体的参考意见。这些意见强调，各公司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尊重人权，尊重他们的雇员，尊重其活动影响到的个人；其保安部队在保护其安全时必须避免践踏人权；要求最大程度的透明度；明确表示不接受或不容忍腐败行为；在其经验显示即将出现冲突时明确地发出信息。

谨再次指出，在冲突局势中，各公司应该拒绝与下述方面做生意或接触：已知直接接受战斗人员协助的个人、公司或实体；向冲突各方提供武器的方面；参与自然资源走私的方面；利用不稳定局势谋取丰厚合约或优惠的方面。

当然，许多公司都支持这种良好做法。英国政府正在开展若干活动，以鼓励和支持工商界的良好做法：第一，我的美国同事已经提到的关于冲突地区安全和人权问题的自愿原则；第二，秘书长所提到的开采业透明倡议；第三，金伯利进程，若干同事已经提到这个进程。这些倡议是新的方式和方法，将促使工商界有效地促进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活动。

但是，工商界在冲突地区的作用在非洲特别突出。历史上，非洲出现过许多产生于可开采资源控制权争端的冲突。今天，非洲仍然存在的三个主要冲突之中，有一个冲突涉及的就是自然资源问题，若干冲突后非洲国家在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方面存在争端。非洲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私人投资。在这方面，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它关注的焦点是解决和预防冲突以及促进私营部门，这是一个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行动。我们注意到并且欢迎目前已经在开展活动，为开采和管理冲突地区资源制订标准。我们还欢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正在南非开展的行动，这项行动使工商界承诺，他们在活动中将遵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高道德标准。总而言之，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强调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对非洲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给与这项值得欢迎的倡议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因为明年将是《千年宣言》发表五周年。

最后，我谨简短地指出，工商界的作用并不是主导解决冲突的活动。但工商界可以作出重大贡献。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国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鼓励企业认识到它们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如果它们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破坏；向工商界介绍冲突地区的活动环境并鼓励它们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

我们希望安理会今天将鼓励所有国家尽其责任，如此告诫和鼓励工商界，并且接受特殊的责任，如此告诫和鼓励总部设在其境内的各公司。

巴哈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感谢四位贵宾参加我们的辩论。作为就此项目发言的第 13 位安理会成员国，要说的几乎都说了。因此我讲一个寓言：谁是最伟大的人。

一个非常虔诚宗教徒和富商参加一次商务会议。为了增加刺激，他提议四个朋友—— 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进行一次比赛。他宣布，朋友们，谁能道出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我包你一个星期的旅馆费用，再给你一份重建“光荣号”的合同。意大利人说，这肯定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因为他发现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人说，一定是乔治·华盛顿，因为他领导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国人说，肯定是温斯顿·邱吉尔，因为他领导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卓越奋斗，而且他的智慧与雄辩举世闻名。

这位商人皆不以为然。这时中国人说，人类最伟大的是耶稣基督。对了，商人说。我叫人支付你的旅馆费用。合同归你了。当这位中国人同商人握手时，商人说，祝贺你说出了地球上最伟大的人，赢了这次比赛。而且我更加钦佩的是，你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中国人说，我仍然认为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但是在商言商吗。

这并不是我们发言的主题。这只是简单说，不论利弊，工商界在国际生活中作用重大。在预防冲突和冲突后重建方面，私营部门是一个全球合作伙伴。在和平时代，工商业是经济成长的引擎；冲突后重建时期，工商界是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工具。

多国公司，甚至中小企业，都有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为预防和解决冲突作贡献。

然而，工商界的作用可以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或者正反兼有，这取决于局势。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现有或潜在冲突局势，但它也有双重作用：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不均，也可以增加而非减少冲突的潜力或冲突的存在。而且，在冲突后局势中，存在有暴力冲突抬头或者死灰复燃的倾向，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加强社会和民用机构。

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认识到它们对社会的正反面影响。但其他公司，包括那些从事军工业或非法毒品贸易的公司，已经确定是造成暴力冲突的直接原因。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虽然工商企业在预防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有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一作用，有以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菲律宾认为，应当建立适当的支助体系。

第一，应创造有利环境，使私营部门能开展业务。光靠工商界做不到。各国政府首先应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建立预防和解决暴力冲突的框架。

第二，需要在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之间形成伙伴合作关系。伙伴合作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贵机制。

第三，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冲突后局势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民间机构。为了预防暴力冲突重新抬头，需要这些机构。

工商企业往往以利为本。但是，在冲突后阶段，它们也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它们可以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支持收缴武器弹药和解甲复员方案。它们也能提供资金和管理支助，帮助建设政府服务能力，包括司法体制和警察部队。

1998 年威尔士亲王商业领导人论坛指出为预防和解决冲突提供有用框架的主要领域。正如经济要务理事会正确指出，

> “预防和解决冲突之挑战在于在公司每一级和社会每一级建立以价值为本的关系。一家公司是助长冲突，或帮助预防冲突，取决于该公司的价值观、政策和作业原则，取决于公司雇员和商业伙伴如何接受、理解和执行这些价值、政策和原则。”

国际社会也是如此。预防冲突与维持和平取决于国际社会的价值、规则和准则，取决于各国如何接受、理解和执行这些准则。

萨登贝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机会参加这次有益的意见交流。我们赞赏你

今天让我们讨论工商界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这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不低估复杂的国内和国外经济利益对冲突的影响。许多情况下，经济因素如有关自然资源或国际市场的争端，可能导致战争，或战争升级。然而，战争与冲突也可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工商业通常以避免风险为本，政治和社会环境稳定实际上即意味着减轻风险。努力预防冲突和在战后帮助经济重建，以减轻风险，也明显符合工商界利益。

今天上午，冯•皮埃尔先生代表西门子公司发言，为我们介绍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以及工商界可为建设和平所作的贡献。

工商界活动促进和平与稳定首要和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创造财富。商业活动为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创造急需的创收机会。商业兴旺，投资、就业与必要商品供应也旺。经济活动的增加也有益于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发展。这将给人民带来希望，正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强调。

通过提高社区地位，公司也为和平作出贡献。可以在某些领域发挥公司的相对优势，如人力资源和管理技能开发、支助民间社会、提高经济地位、促进招聘公平，以及提高劳工标准。

私营企业还能协助管理冲突，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冲突的态度，或根据一项连贯的国家发展政策框架行动，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私营部门可为执行政府方案作出贡献，包括在外来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以及同地方当局和国际社会伙伴合作。这方面，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作用尤为重要。

上星期，我们高兴地听到区域合作正如何帮助重建阿富汗的基础结构以及正在如何采取区域联合行动来对付贩毒问题。贩毒问题是该国乃至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中心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持续的稳定，因而必须被视作建设和平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我们必须时刻认识到，私营部门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采取的行动，是不会为促进和平创造理想环境的。它的行动固然很重要，但却不能取代公共当局的重要行动。后者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必须刺激经济活动，投资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鼓励协作以及在贸易、农业和工业等领域实施稳妥的公共政策。公共当局在这些领域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必须得到政府间组织和维持和平机构的支持。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公共当局还必须有能力和意愿采取与法制、财产权和妥善经济管理有关的措施，并且愿意打击腐败。这些措施将帮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企业得以发展并且参与恢复和重建努力。此外还必须特别重视给中小企业提供奖励，因为它们具备着创造就业的潜力。

一方面，企业参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好处很多，因而企业对重建方案的参与尤应得到鼓励。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企业行动者在冲突中的消极参与，我们必须将它们的活动置于公共监督之下，尤其必须公开肯定各种良好做法。

冲突钻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国际社会可如何采取行动来遏制贸易的消极影响。我们欢迎大会在昨天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支持关于国际认证问题的金伯利进程；它是努力缩小钻石贸易在资助武装冲突方面的作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安全理事会第 1459（2003）号决议也支持目前正在开展的这个进程。巴西已将它纳入本国的国内立法中。

在确立企业做法标准这一领域，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三年前发起的《全球契约倡议》。为了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这个方案已使工商企业和联合国机构、工人协会和民间社会联合一致，帮助促进企业公民意识的基本原则以及增强企业对企业责任做法的支持。许多巴西企业参加了《全球契约倡议》。该倡议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坚定支持。

巴西赞同企业与联合国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各项发展倡议正日益考虑到企业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在这里已经提到的于 2001 年发起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有助于消除非洲大陆的贫穷、不发达和边

际化状况。它包含了这样一种想法：在私营部门的参与下调动资源，帮助为预防冲突和实现和平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在历史上曾有过工商企业介入国际和国家内部冲突的若干例子。当前国际上对冲突时期工商企业的作用和责任的新认识肯定会有助于使工商企业与联合国大家庭、国际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道，成为和平的坚定盟友。尤其是，我们赞同经社理事会主席拉西女士所表示的意见：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社理事会可以一道做更多的工作，导致制定一套全面而更迅速的办法，解决有关国家所处的特殊情况，同时也设想一个面向可持续发展和预防冲突的长期办法。

库马洛大使提到了向几内亚比绍和布隆迪提供合作的一些例子。我们认为，此类合作应予扩大。企业的积极参与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都极其重要，而且也必定对建设和平产生影响。巴西代表团愿意参与一切努力，以强化联合国与工商企业部门之间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德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各位来宾对这次讨论的贡献。我不想重复先前各位发言者已经说过的话。我只想就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作一个简短的发言。其中一个方面是企业责任的总体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全球企业公民意识；另一方面是私营部门的活动在一切发展或重建战略中的巨大潜力。

安全理事会通常没有审议冲突地区企业公民意识的问题。不过，安理会已通过涉及具体情况的各项决议，对暴力冲突所在国和所在区域的私营部门参与问题给予了重视。例如，安理会实施了制裁，目的是减少战斗人员通过冲突商品买卖来为参与作战自筹资金的机会，以此制止敌对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钻石和木材为例。秘书长通过他的全球契约倡议，着重探讨了企业公民意识问题。关于全球契约政策的对话已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已促使 1 000 多家公司和组织自愿从事在社会和生态上很负责任而且可以持续的企业做法。

我的第二点是，冲突后重建阶段的私营部门活动对于可持续地解决冲突来说极其重要，因为这些活动是政治稳定的反映，有助于避免今后再次爆发冲突。多国公司与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协作，能够利用它们的企业技能和资金方面的影响力来促进区域稳定。在和平努力遭到失败的国家，如果在就业、贸易、直接投资和促进地方企业等方面有实际的希望，那么就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理想的情况是，企业的参与会带来两方面的好处：通过投资带来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以及提供管理方面的知识和专长。这一领域的其他行动者——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将会从其自身克服冲突局势的努力中获益。

然而，归根到底，政府或国际组织都无法决定什么最符合私营部门的利益。公司企业将自己作决定，权衡它们在冲突地区介入的机会与风险。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国家政府在这方面需要为私营部门的介入建立必要的框架。究竟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适当对付私营部门因介入冲突后局势而遇到的风险，这个问题在这方面至关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建立稳定的法律框架、法治、充分的行政机构和建立自立的私营部门的明确远景。一个稳定的地区是在国家一级成功发展的先决条件。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东南欧稳定公约》，尽管前面仍然有许多任务。该《公约》含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办法；第二，所有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以及第三，冲突解决的区域层面。

私营部门在冲突所有阶段中的参与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融入由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企业以及民间社会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所伴随的更加广泛的协调一致努力。最后，我因此要鼓励联合国有关机构和组织，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支持和平气氛，帮

助缓解危机局势，以及为和解进程作出贡献。我注意到、并且热烈欢迎秘书长的建议：安全理事会今后应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职责。我请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回答所作的评论和可能提出的问题。

沃尔芬森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认为，作出的评论如此丰富多彩，在现阶段，试图回答所有这些评论将不是一个好主意。让我简单地说，今天上午的讨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当任何成员退休时，如果他们寻求不同职业，欢迎他们加入世界银行董事会，因为清楚的是，安理会的工作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之间有着重要的利益一致。

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无法向各位成员阐明在企业框架、复员、同低收入国家打交道、确保主要的中、小企业的投资、推广贸易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等等问题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世界银行正在处理各位成员提出的许多个别问题。让我简单地说，我欢迎有这一额外的机会同联合国系统一道努力。如果安理会确实采纳这一建议，即今天讨论的议题应该成为安理会审议工作中更加强调的重点，我们随时准备同安理会合作，并且以安理会认为有益的方式给予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西门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海因里奇·冯·皮埃尔先生发言。

冯·皮埃尔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将简略地谈三点。第一，我理解到，对企业如何能够在获利同良好的企业公民意识之间找到正确平衡有一些关切。我认为，找到这样一种平衡是可能的，我并且认为，毫无疑问，绝对必须这样做，因为企业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中。美国代表举了一些成功的公司因良好的企业公民意识而获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还有更多这样好的例子。主席先生，你提到《全球契约倡议》。我认为，参与这项倡议也是企业如何认真对待在企业公民意识领域获得成功的一个例子。

第二、我要回过头来谈谈消除贫困的必要性与缺乏希望。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各国政府以及私营公司之间进行广泛合作，以一种广泛的、有系统的方式推广教育，我将感到高兴。我要强调今天上午人们所说的话——人民想要为其儿童带来希望。推广教育以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项目可以成为一个促进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以及冲突后缔造和平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要谈的第三点仅仅是再次感谢安理会给我这个机会参加今天上午这一重要的、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玛尔亚塔·拉西大使发言。

拉西女士（以英语发言）：正如前面的两位发言者所说的，要说的话很多，但是在这一较晚阶段，我只提几个问题。

许多、如果不是所有发言者提到，可持续经济增长确实是预防冲突的关键。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联合国大家庭、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各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之间非常良好的合作。

问题是，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如何汇集这些多边利益相关者，以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共同努力促进这些好主意？当我们在这幢大楼里讨论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我们一起坐在同样的会议桌旁？这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事情，我们也应该讨论我们如何能够在联合国系统内在这些领域中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我要以个人名义感谢你、主席先生采取这一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主动行动，我确实希望，我们将继续进行这一重要的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给我两分钟时间，以代表安理会发表结论声明。我要在结束今天的辩论时强调可以从今天所作的几乎所有发言中归纳出来的几个事实。

第一，企业确实在解决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二，私营部门参与的方式可能因具体情况而异，但是，我们有若干例子，说明了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吸取的教训。第三，尽管不能保证由于私营部门的参与而成功地解决冲突，但似乎清楚的是，没有企业的参与，解决激烈的冲突几乎不可能。

第四并且最后，各联合国主要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在同私营部门的密切合作下共同努力，以建立必要的政治、安全、经济和金融框架。我希望，这场辩论能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私营部门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以及冲突后缔造和平中的作用。我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分发本次会议的摘要。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发言者的发言，并且特别感谢我们的特邀演讲者，他们参加今天的讨论突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他们特地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讨论。

我的名单上没有人要发言了。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时20分散会